

论“和魂洋才”在日本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张德伟

(东北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

“和魂洋才”是日本在明治时期以来流行的一个口号。它是日本推动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在明治时期直至战前的一段时期内,甚至于在战后的教育改革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正确理解“和魂洋才”的思想内含,以及恰当地认识它在日本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对于我们研究日本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推动其教育的现代化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和魂洋才”思想的提出及其历史背景

1. 何谓“和魂洋才”

所谓“和魂洋才”是指“东洋精神,西洋艺术”,即日本的民族精神与西洋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它既是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根本方针,又是在教育领域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的根本的指导思想,是为明治政府提出的“富国强兵”的总目标服务的。

“和魂洋才”中的“和魂”和“洋才”是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统一的整体而不可分离。其宗旨是在坚持日本固有的传统道德、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近代以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其所用。也就是保持其思想上、灵魂中的原有内核,而饰以物质上、技术上的外壳,使两者都成为推动日本现代化的动力。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内外两张皮的思想意识使日本成功地走向了现代化轨道。

际文化比较”、“外语研修”(包括英、法、德、西、汉、朝、泰、印尼语)、“国际业务适应研修”、“国外生活”、“留学指南”、“赴外支社研修”等7个种类的49门课程,并为全体职工提供“各国市场环境”、“各国劳务”、“各国生活”等13个国际知识方面的录像带、书刊和资料,有意识地培养职工适应企业经营活动国际化的意识和能力。

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通过职业训练进行海外技术协作,通过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其所急需的技术人才来促进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说是技术协作的核心。日本职业训练领域的海外技术协作以往主要是进行如下一些业务:(1)对海外职业训练中心的设置与运营给予指导和协作;(2)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行政官员、职业训练指导员、高级技能工等职业训练领域中处于指导立场的人员的接纳研修;(3)对以提高亚太地区的技能水平,扩大其雇佣为目的的机关——亚太地区技能开发计划(APSDEP)进行协作;(4)推进以国际技能开发计划等为首的以民间为基础的技术协作等。今后除了进一步充实如上一些措施之外,还将进一步完善适应这一要求的体制,包括:确保向职业训练中心派遣的职业训练专家的数量和质量;实施能适应发展中国家多样化需求的职业训练;确立政府对民间企业进行的职业训练领域的海外技术协作的援助体制等。

“和魂洋才”首先是由幕末洋学家、开国论者佐久间象山提出的。他在《省悟录》中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另外，他在这样一首汉诗中也表明了此种思想：“东洋道德西洋艺，匡廓相依完圈模，大地周围一万里，还须缺得半隅无”。佐久间象山认为精神是东洋的好，艺或艺术即科学技术是西洋的好。因此，他对和汉之学持批判态度，对洋学倍加推崇。他曾指出：“方今之世，仅以和汉之学识，远为不足，非有总括五大洲之大经纶不可。全世界之形势，自哥伦布以穷理之力发现新大陆、哥白尼提出地动说、牛顿阐明重力引力之实理等三大发明以来，万般学术皆得其根底，毫无虚诞之处，尽皆踏踏实实。欧罗巴、亚美利加诸洲逐渐改变面貌，及至蒸汽船、电磁体、电报机等之创制，实属巧夺造化之工，情况变得惊人。”^①

作为一个洋学家，佐久间象山虽然推崇洋学，但是在儒学方面，他采取朱子学，尊崇其为“圣学”，把它作为世界观的基础。他强调宋儒的穷理——合理主义实际上正是在洋学中所实行的，认为洋学对圣学是有补益的。对此，他这样指出：“近年西洋所发明许多学术，要皆实理，祇足以资吾圣学”，^②“余则专承当程朱之规，以穷天地万物之理，为斯学起手。汉人所未穷知，则以欧罗巴之说补之”。^③总之，佐久间象山从“只以汉土之学则无道德义理之研究”^④的观点出发，主张“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理兼该，因以泽民物，报国恩，五乐也”。^⑤他的这种思想充分反映了洋学家们东西合璧的学问观。

另外，针对佐久间象山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桥本左内也提出了大体同样观点的主张，即：“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⑥由此不难看出，桥本左内仍然是把儒家思想的“仁义之道，忠孝之教”看作为根基，而吸收西洋“器技之工、艺术之精”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

2. “和魂洋才”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从一千多年以前，日本就开始大量吸收包括政治经济制度、文教制度、法律、宗教、文学等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化，并努力使之日本化。特别是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吸收具有重大意义。在吸收、消化过程中，逐步把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儒家思想置于日本封建政治统治思想的核心地位。这就是所谓“和魂”，即“东洋道德”的全部内含。

在吸收中国古代文化并与其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日本在大化改新后到幕府时期，逐步形成了巩固的封建统治，但是在18世纪以后，幕府封建统治开始快速衰落，幕府则采取各种强压政策维护自己的统治体制，同时还把朱子学作为其思想统治的工具。在这种形势下，“西势东侵”是促使日本洋学兴起，最终导致开国的直接原因。

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欧各国在人文和自然科学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近代科学的运用，使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借助于先进科学技术和大机器生产强盛起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纷纷对外进行文化侵略、扩大贸易和拓展殖民地。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开始直接接触西方文化。以1543年三名葡萄牙人漂至萨南种子岛为契机，欧洲传教士涌至日本传播天主教，进而带入了包括思想、伦理、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等广泛内容的学问。在此基础上，日本在18世纪中叶兴起了通过荷兰语学习和研究西

① ②③④⑥〔日〕永田广志著：《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12月第1版，第260～262页。

⑤《省悟录》，《象山全集》上，第6页。转引自〔日〕《世界教育史大系》第2卷，第199页。

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学问——兰学。兰学的兴起打破了日本长期以来文化锁国的状态，为幕末洋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和1853年、1854年培理两次来航，要求开国对日本朝野震动很大。幕藩政权出于军事技术近代化和“殖产兴业”的需要，开始扶植洋学。一些具有危机意识和兰学基础的知识分子，从救国救民的目的出发，重视对以西方军事科学为中心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政治思想在内的西方科学的研究，并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这样，洋学得以发展。

深受儒学熏陶的洋学家们从富国强兵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洋学吸取论。这种理论观点大体有三种：(1)只承认地理学和军事技术等在对政策上、国防上不可缺少的方面，排斥洋学的“穷理”的最低限度派；(2)在认识自然的领域，也承认洋学的“穷理”，但在哲学、认识论领域则认为应采取东方的传统观念即儒学；(3)认为应该以洋学的“穷理”来代替以往的自然哲学，这样在认识论领域也应尽可能地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其中，以佐久间象山为典型代表的第(2)种立场明显地带有折衷的性质。

综上所述，佐久间象山是在幕府统治走向衰微，西方列强染指日本的迫切形势下，在继承传统的儒学和研习兰学、洋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和魂洋才”思想，试图将朱子学的道德伦理思想和西方科技溶为一体，用西洋之长补东洋之短，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二、明治时期“和魂洋才”的发展与教育改革

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把“和魂洋才”作为维新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以此为指导，大量移植可操作性的西方各种制度，而在实质性内容方面则坚持固有传统。这一点在国民教化和学校教育中则表现为：在精神上，排斥欧美近代文明成果的合理主义思想，而承袭非合理的日本前近代的汉学和国学；在教育制度上，逐渐明显地表现出欧化主义色彩，而教育目的、内容仍然维护“东洋道德”。

1. 关于国民教化和道德教育的论争

明治初期，为了加强国民的道德教育，制定和推行了“采西邦之科学知识，以造于封建武士之精神”的“和魂洋才”的教化方针。为此，政府采取了扶持神道教，排斥佛教，压制基督教措施。1870年1月发布大教宣布诏书，规定由宣教使在全国宣布惟神大道，把神道定为国教。1872年3月新设的教部省颁布“三条教宪”：一、体察敬神爱国之旨；二、明确天理人道；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令神官和僧侣广为说教。这三条教宪的基本精神是神道的，而且国家性色彩也十分浓厚。它明确了道德教化的内容。

从明治初期至中期，在教育思想领域，围绕道德教育问题展开了是“文明开化”还是坚持日本传统的论争，最后以天皇颁布《教育敕语》宣告论争结束。

明治初年，在“王政复古”思想指导下，教育界出现了复古思潮。国学派坚决主张教育要坚持“惟神之道”。就连维新变革的重要领导人岩仓具视起初也主张：全国大中小学要以“彝伦之道为根基”，“彝伦之道明则凡百学问技艺始兴”。不久，随着政府的政策转到“文明开化”的方针上来，一些启蒙思想家和洋学家站在“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立场上提出了自己的德育观。如福泽谕吉主张依靠宗教实现“自主独立的德育”即忠孝

教育；加藤弘之从反对恢复儒教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立场出发，主张按照神、佛、耶、儒四种宗教教育建立修身科；森有礼从批判孔孟之教的迂腐性出发，主张以近代社会的伦理为基础建立德育的根基，把忠君爱国精神作为国家富强的基础。与此同时，一些保守派从维护传统道德的立场出发，或批判“文明开化”，或主张“东西调和”。如元田永孚始终坚持儒教教育观，主张以仁义忠孝的孔子之教树立国教的基础；西村茂树采取折衷观点，主张“以儒教为本邦道德之基础”，以西洋哲学为参考，企图对东、西思想加以综合。

1879年9月颁布元田永孚起草的《教学大旨》，导致了保守派与开明派的正面冲突。《教学大旨》的中心内容是：文明开化导致不少人“品行败坏，伤风败俗”，而失去日本的传统，强调教育应“本祖宗之训典，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对此，伊藤博文写了《教育议》，对元田的儒教国教观作了批判。接着，元田又写了《教育议附议》，着重强调按照祖宗遗训建立国教的重要性。

由于在德育理论上出现了各种思想纷争的局面，使文部省一时难以确定德育方针，在实践上，德育处于完全被忽视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明治天皇站在维护封建道德的立场上，于1890年10月30日签发了由元田永孚等人制定的《教育敕语》。《教育敕语》统篇贯穿着忠君思想，把天皇看作是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的化身，同时认为儒家道德是“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它把儒教的忠孝仁义等思想和“博爱”、“启发智能”、“重国宪遵国法”等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规范以及“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伦理结合了起来。从中不难看出和、洋结合的性质，体现了“和魂洋才”思想。

2. 日本独特的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确立

明治初期的学校教育仍然沿袭幕末以来“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方针。这主要表现在“在高等教育上，恢复儒学、国学、洋学教育机构；在中小学教育上，设立了新式中小学校，但教学内容是传统性的；制定了保守的学制。

明治初期的高等教育表现出的是复古倾向。1868年恢复了以儒学教育为朝廷培养人才的学习院和原幕府开办的医学所、昌平学校、开成所等洋学教育机构，同时又在京都新设了皇学所和汉学所。1868年12月制定的《皇学所规则》规定的方针是“辨国体正名分”，“汉土西洋之学共为皇道之羽翼”。从中不难看出，明治政府以皇道主义为原则，吸取东西方文明的态度。明治初期儒学、国学、洋学三种高等教育机构并存的局面是当时坚持“和魂洋才”思想的反映。

与高等教育的复古倾向相对照，在初中等教育方面则开办了新式的中小学。维新伊始，率先开设小学校的是京都，其次是东京府。从1869年5月到1870年6月，在京都和东京共开设了70所小学。此后，各府藩县也纷纷设立小学校。1870年8月以后，东京府和京都府开始设立中学。从形式上看，明治初期的小学是以新方式对江户时代的寺子屋和私塾进行的改组。但其教学内容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先前的传统，如初创时的京都小学就设有“心学道话”一科。

维新伊始，新政府在制定学制方面体现了坚持“和魂洋才”思想。明治政府成立后，即由玉松操等国学家制定了非常保守的复古色彩浓厚的学舍制，但未实施。1869年又由

箕作麟祥等洋学者和皇学所、汉学所人员制定出《学校规则》。它指明了尊皇道辩国体为学者之先务的教育理想，同时为推行“求知识于世界，以振皇基”的现代化，又规定要摄取“西洋之格物穷理开化日新之学”。1870年2月又推出森有礼、加藤弘之等制定的《大学规则及中小学规则》。“规则”的根本精神仍沿袭“学则”精神，但删去了其中的皇道主义内容；在大学的学科上，取消过去按国别分类即国学、汉学、洋学的编制方式，采取教科、法科、理科、医科、文科五分科结构；对中小学的入学、结业、学科等也作了规定。“规则”所规定的教育制度是模仿欧美国家的，但内容却是沿袭日本传统的，如教科、法科、文科的必读书目列举的是古事记、日本记、万叶集、孝经、论语、中庸、诗经、书经、礼记等国学和汉学的基本文献。这种新旧结合仍然是继承幕末以来“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的制度和精神相分离的方针所使然。

1871年以后，随着政府的政策正式转到“文明开化”轨道上来，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是由西化到日本化的过程，从中也反映出了“和魂洋才”思想。1871年7月文部省成立后，即着手制定学制。翌年6月提出了主要按照法国模式制定的《学制》草案，8月3日正式公布。同时颁布的太政官布告表明了学制的指导思想，即：①功利主义的学校目的论；②平等主义的教育原则；③实学主义的学问观；④学校费用由受益者负担。按照《学制》和太政官布告精神实施的教育有如下特点：①在学校设置上，采取法国的学区制；②在教育行政管理上，采取法国的督学制；③教学内容和教学法则主要参考和学自美国，等。《学制》的基本精神是非常进步的，但是实行的八年实践表明严重脱离日本当时的实际情况，故而被《教育令》所取代了。1879年效仿美国的教育制度制定了自由主义的《教育令》，目的在于消除《学制》的强制性弊端，适应地方自治和尊重自由的时势，大力振兴教育。可是《教育令》也不适合日本的情况，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入学率降低、学校数几无增加等倒退现象，所以后来又被《学校令》代替了。1886年公布了森有礼参考德国模式制定的《学校令》。森有礼强调以忠君爱国思想教育学生。《学校令》体现了他的“国体教育主义”思想。可以说，《学校令》是森有礼在坚持“和魂洋才”基础上对《学制》以来的教育理念进行反省的结果，它的制定和实行使日本的教育走向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三、“和魂洋才”与战后教育改革

如前所述，“和魂洋才”是由幕末著名洋学家佐久间象山提出的。它作为建国的指导方针和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对明治时期确立近代教育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应看到，这一思想为军国主义分子所利用，成了促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武器。因而可以说，“和魂洋才”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但是它作为一种思想对战后的教育改革也有一定的影响，不过由于战后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影响的表现形式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在此仅就几个侧面加以分析。

首先，关于个性教育问题。尊重个性的教育是战后教育的重点之一。《教育基本法》指出：“我们期望培养注重个人尊严并追求真理和爱好和平的人才，同时还必须彻底普及旨在培养既有普遍性又有富于个性的文化教育”。从中不难看出，这里强调的个性是在普

遍性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原理既吸收了美国提倡的个性自由思想，又融进了日本传统的集团观念。重视个性的原则同样也是第三次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原则，把个人的尊严和尊重个性、自由作为今后教育的基础。这里所讲的个人、个性、自由等包含着东西方个性自由观融合的“和魂洋才”思想。正如临教审所指出的：“所谓个性，不仅指每个人的个性，而且也意味着每个家庭、学校、社区、企业、国家、文化以及时代的个性。……只有真正地认识自我的个性，培养和发展它，并做到尽职尽责，才能更好地尊重他人的个性，发挥他人的个性。”“自由的含义根本不同于放纵、不负责任、无纪律、无秩序。自由是和认识自己的责任重大同时并存的；生活在自由选择增多的社会里的人们，一面享受着自由，一面又必然为自由尽自己的义务。因此，个人的尊严、尊重个性、自由、自律、尽职尽责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临教审更明确指出：“有个性的个人团结起来就构成了有生气的集体。”看来，日本的个性教育是个性——集体、自由——尽职责的教育。

其次，关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这与“和魂洋才”思想也有着深层的关系。战前，日本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教育行政上也贯穿着强烈的敕令主义色彩。这既是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结果，又是为了维护天皇制的需要。战后，美国的分权制思想对日本影响很大。美国教育使节团曾建议日本实行地方分权制教育行政体制。根据美国教育使节团的建议和教育基本法的精神，1948年7月公布了《教育委员会法》。根据该法，大大加强了地方教委的权限。1949年5月又公布了《文部省设置法》。根据这一法律，把文部省原来的监督统治机关的性质变为了服务机关的性质。这样，就确立了地方分权的教育行政体制。但是5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被结束占领而独立，其教育行政体制也发生了较大变化。1956年废除了教育委员会法，制定了《关于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经营法》，改变地方教委的公选制为任命制。同时又多次修改了文部省设置法，加强文部省的权限。这样，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教育行政体制。这一体制的确立，不单是制度上的变革，而又是观念上的变革，是受美国的影响，坚持教育上的民民主义和法制主义，同时又想继续维护长期以来中央集权主义的传统，受东西两种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基本事务上，文部省是援助、服务机关，地方教委有较大权力，而在决定教育内容等方面，文部省具有很大权力。因此不能不说，确立这种体制的思想根源是“和魂洋才”。在第三次教育改革中，文部省仍然指出“加强教育上的地方分权”，但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结合的根本性质至今没变。

第三，战后道德教育领域中的“和魂洋才”思想。战后初期，根据美国占领军的教育政策，日本政府对有关德育内容进行了改革。1945年10月21日，占领军总部对日本政府发布了“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政策”的指令。同年12月15日和31日又分别发布了关于“废除政府对国家神道和神社神道的保证、支援、保全、监督和推广”及关于“停止修身、日本历史和地理课程”两项指令。根据这些指令，文部省删除了教科书和教材中的反动内容，停止了修身、日本历史和地理三门课程；从学校中清除了神道教育和有关的仪式、设施；为振兴公民教育，鼓励讲授与议会政治、国际和平、个人的权威与集会、言论、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的思想相符合的观点。因而，在战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德育课，在其他科目中灌输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观念。但是，在1958年的课程

改革中又特设了德育时间。在德育内容方面，强调既坚持西方的民主主义又要维护日本的传统。这一点在《所期望的人》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1966年10月中教审发表的《所期望的人》，可以说是对德育思想的总概括，体现了“和魂洋才”思想。它指出：培养所期望的人有三个要求，即提高人性，开发人的能力；面向世界的日本人；确立民主主义。它还要求日本人：（1）作为个人要讲自由，负责任；发展个性；具有坚强的意志，做有出息的、有勇气的人；养成宗教情操，对生命根源具有敬畏之念。（2）作为家庭成员要讲亲情，有爱心。（3）作为社会成员，要协调合作，热心工作；遵守法制，尊重社会规范，树立公德心，等等。（4）作为国民，要具有纯正的爱国心；虔敬天皇；发展勤劳苦干等优秀的国民性。《所期望的人》所表达的思想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是战后民主教育的反动。对此，我们要有明确的认识。

综上所述，“和魂洋才”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对日本在明治时期及战后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制度，从而振兴国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在确定“和魂”的思想内容上，无论是战前把“神授土地”思想作为日本精神的核心，把天皇视为全部道德的化身，还是战后强调民族主义的爱国心教育，如“对天皇的敬爱之念，说到底是与对本国的敬爱之念相通的”云云，都是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表现。以此为核心进行德育势必会对青少年及广大国民带来极坏的影响。所以说，只有恰当地确定本民族的思想支柱，维护精神上的自主性，才是正确的选择。

从“和魂洋才”的积极性和阶级局限性两方面去认识它，是正确的、有益的。

主要参考文献

1. 梁忠义主编：《日本教育发展战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2. 〔日〕永田广志著：《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12月第1版。
3. 钟启泉选编：《日本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4. 国家教委情报研究室编：《今日日本教育改革》，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5. 〔日〕坂本太郎著：《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第1版。
6. 武安隆著：《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